

近代中国青年组织流变

吴佳齐

(河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摘要:20世纪初,基督教传教团体在西方势力入侵下进入中国,受其影响,国内开始自创青年组织。新文化运动爆发后,青年组织尤其是学生组织发展迅速,青年运动迭起,其活跃程度达到史上顶峰,并在反基督教运动中赢得阶段性胜利。国民革命爆发,国民党借助改组吸收大量青年开展革命斗争。国共合作下国民党青年组织逐步分化,而共产党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建立起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领导青年工人和学生从事一系列斗争工作。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共青团在共产党带领下展开了支援抗战、提供战时服务的工作;国民党内部则形成了以三青团为主的青年组织群体,领导国统区青年参加抗日活动。至此,青年组织形成了以两大“列宁式政党”为指导的格局,直至抗战结束。

关键词:传教团体;青年组织;青年运动;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D2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303(2021)02-0051-09

一、国内早期的青年组织： 传教团体影响下的 基督教青年会

自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过剩的资本积累成为新的问题,他们期望通过“时空修复”来换取资本积累的持续性,于是一场掠夺式的开发开始在全球盛行。彼时的中国正沉浸于泱泱大国、万邦来朝的幻想中无法自拔。最终,根深蒂固的传统思维被外来入侵打破。从晚清直到民国,外国人给予中国人的影

响,甚至参与到中国人生活中的程度之深刻让人难以想象。最初来到中国的,便是向中国传播福音事业的新教传教士们。1900年,基督教传教团体在中国普遍受袭,由于西方势力入侵,他们便顺利地在中国获取了治外法权的保护,教会团体与不平等条约的共生关系使得他们在中国迎来了新的发展机会^[1]。表1总结了20世纪初的新教团体数据,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教会团体发展迅速。由于在中国传教事业面临巨大挫折以及西方宣教会方面的传教压力,新教团体开始从改变中国人的个人信仰转向教育和医学方面的大力投入,于是大量的教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团

收稿日期:2021-01-03

作者简介:吴佳齐(1997—),女,河南驻马店人,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学。

体纷纷建立,主要吸引对象就是青年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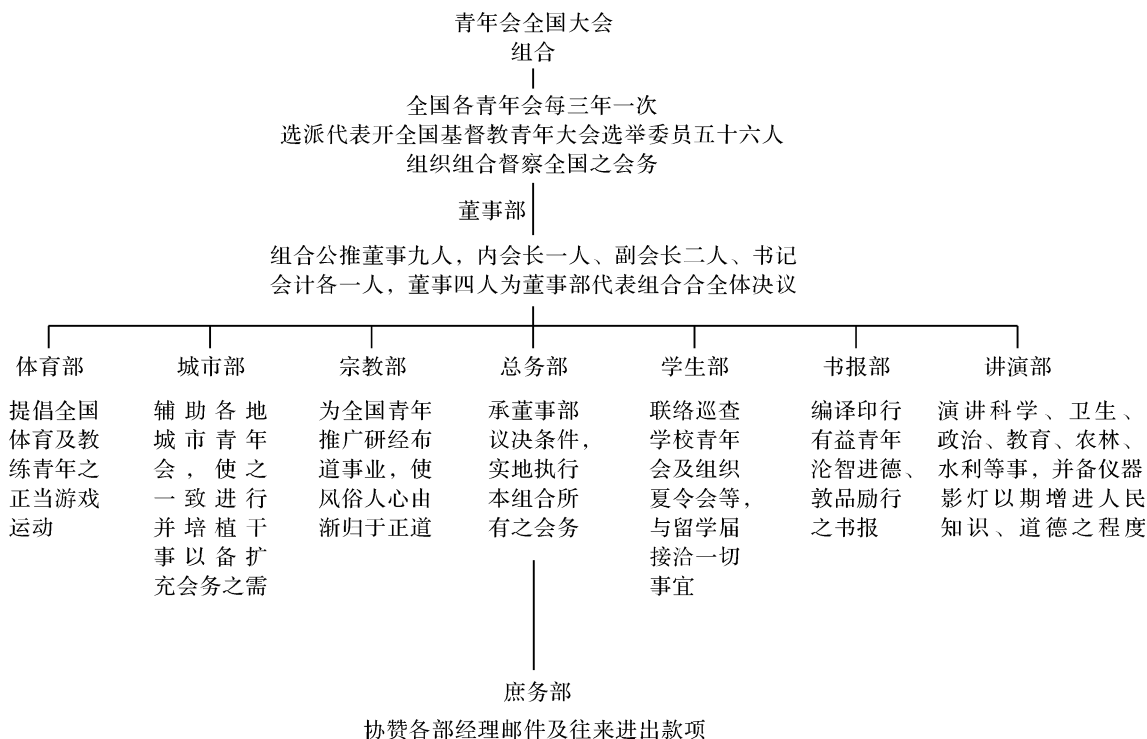
表1 在华新教教会的发展(人)^[2]

年份/年	1889	1906	1919
外国传教士	1296	3833	6636
受有圣职的华人	211	345	1065
中国的工作人员	1657	9961	24732
有权受圣餐者	37287	178251	345853
教会学校学生	16836	57683	212819

基督教青年会(简称青年会),是基督教会创办的、具有宗教性质的社会服务团体。青年会以纯粹辅导青年为宗旨,号召青年发展德智体美,并培养青年开展社会服务。青年会从行政结构上分三个部分:青年会全国协会、城市青年会和学校青年会。全国协会是青年会的最高行政

机构,对各地城市青年会和学校青年会有指导权和协调权^[3]。城市青年会分布于全国各主要城市,包括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和西北地区,形成了强大的势力和网络^[1];学校青年会以教会学校为依托,两者相辅相成。青年会日常活动多以布道会、祷告、宣讲会等形式为主,“夫所谓世界基督教学生团者,一纯属学生之组合体,以感导学生生者也,其为团者,为学生之活泼结合,并不迫人于同出一模,而使人人有完全之自由。其团之所以坦然勃兴于各大学校各邦各国教会,而纤芥无碍者,殆以此道欤”^[4]。直至1912年,中国才正式成立青年会全国协会,并于北京召开全国大会。至1916年,组织设置逐渐完善,权责结构也开始显现,且颇具规模,具体组合系统见表2。

表2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组合系统一览表^[5]



基督教青年会早期的宣讲与布道活动虽集中面向青年群体,但由于受西方宗教文化中“善”“爱”等观念的影响,主要关注穷苦人民。其活动大多以捐赠、援助等形式为主,这也间接

形成了我国早期社会服务事业的源头。同时,为了更好地传教,学校青年会一般都会提供基本的食宿,并且依托教会学校在组织上、教学方法或课程设置上的不同,吸引大量青年学子。但是,

这种做法同样也面临着与初衷背道而驰的风险,即大多数青年学子仅仅是为了某些功利目的而加入学校青年会。

但此时的国人并未意识到要建立青年组织。有史记载,最早的由中国人创办的青年组织是1895年康有为在北京组织的强学会以及1895—1898年兴起的改良学会。其最大的特点,一是以学习西方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为主导,二是以探索、回应、传播西方知识与文化为主要内容。这一时期,西方思想不断涌入,儒家伦理思想被逐渐打破。这得益于政府积极推行的新式学堂教育,“从1905年开始公私立学堂一跃而上,特别是公立学堂,一般占总数的2/3……随着新式教育的发展,形成了一个规模可观的近代学生群体,并产生巨大的社会能量和影响”^[6]。

二、青年组织发展高潮迭起: 掀起巨变的青年运动

(一)国内自办青年组织的蓬勃发展

1915年,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以《新青年》为阵地展开了一场反对传统与孔教的新文化运动,以他们为代表的新青年开启了为国家与民族复兴而奋斗的新纪元。1919年之前,新式知识分子对传统伦理的批判破除了伦理中心主义的思想观念,传统意识形态逐渐被抛弃;一战结束后,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战场的一片狼藉,加上中国外交上的失败,使得国内一些有识之士逐渐失去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幻想。在如此内忧外患的局面下,学生运动汹涌澎湃,青年组织尤其是学生组织发展迅速,其活跃程度达到史上顶峰。新一代知识分子精英经历了若干重要的变化:一方面,出现了各种新式报刊和新联系方式的社团;另一方面,建立了各种类型的学会和政治性党派^[1]。

1918年7月1日,王光祈、李大钊、曾琦等人

联合青年有志之士在北京正式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学会以“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出版了《少年中国》杂志。学会最初有会员42人,后发展至120余人,此后其成员逐步遍布国内外,组织并领导了著名的五四爱国运动,建立了工读互助团,但由于学会成员太复杂,最终分裂。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在长沙组织了新民学会,在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的影响下,一度十分活跃。五四运动后,新民学会在长沙各校的进步学生和青年教师中进一步发展会员,到1920年底,会员已达70余人^[7]。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一大批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爱国团体和进步刊物逐步涌现,1918年,成立全国学生统一爱国组织——学生救国会;同年,在北京大学成立国民杂志社,并于1919年创办《国民》杂志;同年,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在北大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杂志。他们都积极宣传反帝爱国新思想,积极为五四运动奔走呼号,但之后由于内部成员信仰不同,组织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分化。比如:国民杂志社中既有邓中夏、黄一葵等先进青年,也有许多无政府主义者,还有后来成为反革命组织AB(Anti-Bolshevik)头子的段锡朋^[8],而新潮社绝大多数成员在五四运动后思想迅速右转。此外,1919年,邓中夏等人发起成立了进步平民教育讲演团,五四运动后把宣传活动转向工农群众。后来,周恩来、马骏等人组织天津进步青年成立了觉悟社,一度成为天津学生运动的主导社团。后来,觉悟社大多数成员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或社会主义青年团。还有很多其他青年组织不胜枚举。

不难看出,近代青年组织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号召力以及强烈的忧患意识。这些组织大多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危机促动下的自发性,大多数组织都是由一些进步分子受当时一系列民族危亡事件的激发,自动组织成

立的；二是拥有共同的救亡目标，这些组织成立时虽然内部成员复杂多样，思想主张各不相同，但都能为共同的救亡目标聚集到同一个旗帜下；三是具有一定的资源，包括人力、物力等，这些组织的成立都以当地一些有影响力、号召力的人物为主导，以大学生和进步知识分子为依托，通过会员缴纳会费或是创办报纸作为重要的资金来源。

但是这些组织仍然存在不少的缺陷。首先，组织结构不够多样，组织内部的权责体系也不够明晰。从北大新潮社的大事记来看，其组织仅包括编辑、干事两个部门。傅立鱼等人创办的大连中华青年会分为七大部：学校、体育、图书、卫生、救济、讲演和其他^[8]。其次，青年组织大多数是基于特殊政治事件的激发而成立，并不持久。少年中国学会最终分裂、停止活动，工读互助团最终解散，新潮社成员大多右转，觉悟社成员仅极少数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等等，从这一系列的事件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青年的运动，自‘五四’以后便没有更深广的发展，不能持久”^[9]，致使青年组织似有销声匿迹的趋势。可以说，这一时期国内自创的青年组织虽不断涌现，但在具体组织模式上仍处于起步阶段。再加上当时国内建立青年团体组织的意识不强，创办青年组织的资金不足，创办青年团体组织的经验不够，没有成熟的组织模式可借鉴等一系列条件的限制，当时国内自办的青年组织并未得到长久的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国内青年组织的政治参与，尤其是对公共事业的参与逐渐增强。

（二）反基督教运动下的青年会

20世纪初，由于拥有充足的资金支持，以及欧洲等其他国家的扶持，基督教青年会开始在中国蓬勃发展。经过十几年的积累，已颇具规模，具体情况如表3所示。1918年，孔教批判和文学革命如火如荼地展开。随后，以青年学生为主的五四运动爆发并迅速席卷大陆。《新青年》在

批判孔教，却一直没有批判西方宗教，直至1922年被“缓议”的关于西方宗教的讨论，终于以“社会运动”这一形式而爆发，即反基督教运动。当时不少人把基督教所有的活动批得一无是处，有不少人认为“第一，教会教育是侵略的；第二，基督教制造宗教阶级；第三，教会教育妨害中国教育的统一”^[10]。一时间，反对基督教的情绪暴涨，从表3的数据可以看到，此时的青年会增幅变缓，收入支出骤减，基督教在华传教活动和各项世俗事业都受到不同程度打击。与此同时，教会学校的学生不断举行反对读经祷告、驱逐洋教员的运动，甚至纷纷掀起了退学风潮，其目的就是要求政府控制教会学校。“1926年北洋政府教育部规定，外国人在华捐资设立的学校，必须办理立案手续，校长必须由中国人担任。随后，圣经课逐渐被取消，反基督教运动至此取得了阶段性成果。”^[11]

表3 1917—1925年青年会的发展变化^[12]

年份 (年)	城市青年 会(个)	学校青年 会(个)	会员 (人)	城市青年会经费(元)	
				收入	支出
1917	28	145	41480	444740	433046
1918	28	159	49225	499936	463259
1919	30	169	45500	575197	—
1920	31	184	58957	750556	687479
1921	35	186	71080	900126	857361
1922	40	197	77956	976041	945197
1923	42	201	68379	905897	939564
1924	43	207	73353	894797	906069
1925	43	206	79764	833881	873247

三、国民革命下的变化： 分化的青年组织

（一）国民革命下的青年组织

1924年1月，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这次改组的动机，一方面，是把党内腐化叛变分子淘汰出局；另一方面，“把当时的热

血青年吸收进党”“已经加入共产党的分子，只要拥护三民主义，也可自由加入国民党”^[13]。由此，开启了国共两党以反帝反封建、对内推翻军阀、对外推翻帝国主义为主张的第一次党内合作。在这次合作下，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也得到了国民党的承认与支持。同时，这一时期也要求知识青年们担负起“第一，努力唤醒有战斗力的各阶级；第二，努力做有力的各阶级间之连锁，以结成国民的联合战线”的责任^[14]。但在当时国民革命大背景下，“因全国三种不同的政治环境而使学生群众表示三种不同的趋势”^[15]。首先，在北方反动军阀统治下，“北方学生自三一八大屠杀而沦于黑暗反动的政治压迫……一切学生会工作，社会活动均绝对无发展的余地，学生中的活动分子不断受白色恐怖的袭击而入狱丧生”^[15]。其次，在蒋介石统治下的江赣粤闽等处，“利用青红帮，以武装改组各地学联会及各学校学生会”^[15]。最后，在国民党反动政权统治下，北伐军进驻武汉后，学生群众仍然保持着强烈的革命决心，继续从事更为紧张的革命斗争。

（二）国共合作下的分化

随着国共两党以党内合作的方式进行第一次国民革命，此时参加青年运动或在青年群众中活动的组织主要分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国民党左派、国民党右派、醒狮派及基督教派五种。对这一时期青年组织的行动及成败总结如下：

1.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CY）。这是“一国际的组织，他是按着马克思共产主义和列宁主义，在共产党的指导之下去进行社会革命的青年组织”^[16]。在五卅以前，CY团员主要“以小资产阶级的学生占多数，工作的范围不广”^[15]；在参加并指导了五卅运动后，CY团员数量飞涨，至1927年前后，“CY团员较五卅以前增加了二十倍”“团员的成分亦有进步，青年工人、店员、

农民占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工作范围更加扩大，形成团结在列宁主义周围的青年群众的战斗组织”^[15]。CY在反奉、反直、反孙、北伐等一切反帝国主义斗争中，在反对基督教、戴季陶主义、醒狮派等的思想斗争中，在领导青年工人学生从事反资本主义压迫中，在反对反动教职员斗争工作中都有很大的成就。

2. 国民党左派。国民党左派青年是CY最亲密的同盟者，国民党中央青年部是指导左派青年的最高机关，一度被甘乃光、邵元冲等右派分子把持，并建立LY、“土的派”等小组织，后脱离当地的学生联合会，实力受到削弱。但湘、赣、鄂及沪、京的青年部仍旧不减革命热情。左派青年在反军阀、反帝国主义、反醒狮派等的斗争中以及指导青年从事政治、文化斗争的工作中仍有很大的成绩。

3. 国民党右派。“国民党右派在青年中的活动，是从五卅后戴季陶小册子的发表而开始的”^[15]，右派主要代表资产阶级意识，以反CP（Communist Party）、反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派内重要的组织有孙文主义学会（仿照CP、CY的组织法则，以反CP、反阶级斗争为政纲）、土的派（Stickist，孙文主义学会派的武装支部）、黄埔同学会（由蒋介石为扩大自己的势力而组织，成员中左派占大多数）、青年工作团（由甘乃光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长时所提倡，以团结左派青年为号召的一种组织，后为孙文主义学会所利用，成为专门反左派、反CP的反动组织）、甘乃光所组织的LY（借左派二字以织罗青年的一种组织，实际上是甘乃光站在CP与右派的冲突之间挟以自重的工具）、江西段锡朋等人组织的SM（与孙文主义学会同出一脉）等等。

4. 醒狮派。醒狮派又称“中国青年党或国家主义派”，是一部分富有东方封建士大夫思想，同时又接受了一点西方帝国主义思想的反动留学生所发起的青年组织。“组织的中心是曾琦、李璜、余家菊等人在法国发起的青年党，同时在国

内各地一般青年群众中,又以各种标榜国家主义的青年团体联合成的一个国家主义青年团体联合会”^[15],以反共反俄、国家主义为主要论调,“在组织上因北伐之胜利而起了分化,一部分觉悟了的已脱离了他们而加入国民党”^[15]。

5. 基督教派。基督教此时在中国已扎根数十年,早年的“中华归主”运动早已使其积累了丰富的组织经验和广泛的青年群众基础,且建立教会学校、讲演会、查经班等吸引青年群体。针对儿童设有蒙童团部,主要活动包括读经、祷告与服务工作,即“每安息日当分送单张小册于邻居亲友,凡所认识者”^[17]。但1924年8月,上海有些青年重组“非基督教同盟”,并借《觉悟》副刊出版周刊,以告诫群众反对基督教并认清基督教的本质,使得青年会和教会学校再次受到不小的打击,后在国民政府统治下“不能像以前一样恣无忌惮地活动”^[15]。

就整体情况来看,这一时期的青年运动多以救国救民为宗旨,以动员工农群众、宣传意识形态为主要任务。后来,由于北伐的共同目标,国共两党开始党内合作,而国民党内部由于派系林立从而产生了分裂。总的来说,当时的青年组织一部分是拥护革命,为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共同目标而积极维护学生统一运动的组织,主要包括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国民党左派;另一部分则是反CP、反阶级斗争、破坏学生运动的组织,主要包括大部分的国民党右派、醒狮派、基督教派等。然而,随着汪蒋开展反革命活动打击共产党员,国民革命失败,国共合作也随之破裂。国民党统治下的左派中,像孙文主义学会、LY、SM等大多数都以解散告终,醒狮派一些成员后期也都加入国民党,基督教派为了寻求生存也加入国民党阵营中,而共产党则带领着部分青年走向了开发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道路。至此,青年组织形成了以两大政党为指导的格局,并长期占据领导青年组织的主导地位。

四、战时的青年组织： 动员与服务

(一) 共产党领导下共青团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科收起义后,共产党开启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历程,当时在根据地,团组织跟党组织一样都是在秘密发展。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团组织也大大发展起来了。据统计,1930年,根据地团员达到十万人^[18]。根据地的青年组织除共青团组织外,还有在共青团直接领导下的少年先锋队(简称少先队)。少年先锋队是共青团的一种附属组织,青年团通过这个附属组织扩大它对广大青年群众的影响。青年团是劳苦青年群众的先锋队,它是一个在党领导下的战斗的、群众的、青年的、工人的共产主义组织;少年先锋队应当是一个更广泛的辅助组织,吸收城市和农村中的劳苦青年到它的队伍中^[19]。参加少先队的成员是16岁到23岁的男女劳动青年,其中部分人成为少先队的领导骨干后必须加入青年团,成为青年团团员。

在云、贵、川地区革命根据地的逐步扩张与巩固的前提下,1935年,共产党西北根据地正式形成,党组织和政权也随之建立和完善,这也为西北根据地共青团组织的进一步建立提供了有利条件。1935年2月,中共西北工委成立时,西北根据地没有建立统一的共青团领导机构^[20],整个西北苏区团的工作都由共青团陕北特委领导。直至11月,为了适应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需要,团结各界青年抗日,党中央发布了《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要求改造共青团成为广大青年群众的抗日救国组织,共青团陕北特委改建为少共陕西省委员会。直到1937年,基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需要,少共陕西省委改为陕北青年救国会,成为抗战时期重要的青年组织,并

由此展开了支援抗战、提供战时服务的工作。

青年救国会作为抗战时期党领导下的重要青年组织,其工作包括:

1. 向青年进行抗战宣传和动员。主要是配合党的任务向青年讲授军事、作战常识,组织读报学习等。

2. 动员青年参加抗日武装。这是青救会的中心工作,除动员青年积极参军外,还组织一部分积极分子参加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青抗队,是坚持生产的半军事性自卫武装组织)。

3. 协助党和政府开展国民教育和群众文化活动。西北根据地群众一般文化落后,学校稀少,由于青救会配合有关方面努力工作,“到1940年,学校就从1938年的73所增加到1341所,学生由16725人激增到43625人,青救会还举办夜校、冬学600处”^[21]。

4. 发动广大青年积极参加生产和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工作。青救会组织动员青年开荒种地、植树造林、饲养牲畜、发展家庭手工业等,推动了大生产运动的发展。这些活动使青救会一度成为当时最受党和民主政府欢迎的组织。

此外,由于党中央十分重视青年的培训与教育工作,在各地开设干部培训班、学校、青训班等,提高了青年的文化水平与爱国热情,培养了大批青年干部。“至1937年7月初,中共中央党校在到达陕北一年内,培养了近1000名学员……青训班从1937年10月1日开办到1940年4月,共办12期,培养青年干部一万多名。”^[21]以至于后来华北地区“干部绝大多数是在1936年、1937年参加工作的学生”^[22],并且在1938—1939年吸引了大批爱国青年,形成了“天下人心归延安”的盛况。但是,在1939年到1941年,部分地方的青救会出现了青年主义的错误倾向,即离开党的中心任务、片面强调青年工作的独立性等。为此,党中央在1941年6月4日做出《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又叫“六·四”决议。这次决议做出了青年运动应该统一于党的领导之下的

决定,为当时乃至之后的青年工作开展指明了方向。直至解放战争时期,青救会等青年组织一直都在党的领导下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而不断斗争。

(二) 国民党领导下的青年组织

随着国共合作破裂,除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组织之外的其他青年组织尽归国民党统治之下。然而大多数左派解散,国民党领导下的青年组织也逐渐减少,仅存复兴社(以黄埔系精英军人为核心,组成的一个带有情报性质的军事性质团体)、CC系(以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为首的在国民党内的一股势力)等为数不多的青年组织。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统治区内的青年学生组织了救国宣传团体,与各地学联一起强烈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蒋介石为谋求全国青年的支持,给已经衰老腐败的国民党增添“复兴力量”,于1938年6月16日以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团长名义,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以抗战建国为纲领,表示“欲完成抗战建国之艰巨事业,自必要更有需于全国青年之一致团结共同努力”^[23],并派遣复兴社和CC系骨干分子组建三青团,其中复兴社最终完全并入三青团,至此国民党内部形成了以三青团为主的青年组织群体,领导国统区青年参加抗日活动。

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产生,第一,为求抗战建国之成功;第二,为求国民革命新的力量之集中;第三,为求三民主义之具体实现。三民主义青年团以“团结革命青年,力行三民主义,捍卫国家,复兴民族”为宗旨。其团内“组织系统分为中央团部、支团部、区团部、分团部、区队、分队”^[24]。“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任务与工作是:第一,积极参加战时动员;第二,实施军事训练;第三,实施政治训练;第四,促进文化建设;第五,推行劳动服务;第六,培养生产技艺。”^[25]同时,国民党为坚持训政目标,要求对青年进行一系列思想体魄、卫生修养等方面的训练。通过大力宣传活动,组织青年从军,或是加入抗战后方服务队伍,告诫

五、总 结

青年要勇于进取、勤于学问。通过青年运动使“青年人担负起使命,不辜负他的贵重”,同时,又能“锻炼青年之身心,陶冶健全有为的国民”^[26]。但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党争不断,三青团也难逃被腐蚀的命运,最终沦为蒋介石进行党争的工具。

由于青年纷纷自愿从军或加入后方战时服务团体,青年组织队伍不断扩大,各地青年营、青年团纷纷建立。“一般青年团体的工作,首先是训练和教育团内青年,以研究会、讨论会、训练班等来提高青年抗战意识,提高青年团结与组织观念,以及军事救护技术等等。其次是训练教育民众,组织流动宣传队、流动剧团及举办通俗讲座、民众学校等。”^[27]各地青年组织发展迅速,以浙江为例,“每县都有青年独立的组织,而且都有一二千以上的青年群众,在各县的救亡运动中都处主导地位”^[27],甚至深入偏僻落后的广大农村,具体组织情况见表4。另外,虽然一些教会学校由于抗战遭到迫害,但仍有学校成为庇护之所,为当地青年学生甚至是居民提供圣餐、衣物等。直到抗战结束,这些青年组织仍在为抗战胜利以及服务军队而四处奔走,并在中国抗战史以及中国民族革命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功绩。

表4 浙江青年组织一览表^[27]

各地县青年 独立组织	①永嘉的战时青年服务团、平阳的青年救亡团、乐清的青年服务团 ②甯、绍、金等属也都有青年救亡组织和青年救亡活动(规模较小,带有地方性)
学生组织	①温州学生抗日联合会 ②临海东山中学学生会组织 ③天台大公中学学生会组织
儿童组织	儿童战时服务团(属于永嘉各小学联合组织)

通过对我国近代青年组织的历史进行梳理、分析,可以看出,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期,青年组织一直处于外部介入下的简单模仿与萌芽阶段,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功能上,都不够成熟与完善。至“五四”时期,我国青年组织才开始走向自我发展之路,并且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都显示出其蕴含的巨大能量,但仍存在组织体系不够健全,随政事兴而兴、随政事毕而衰的弊端。国民革命时期,国民党领导下的青年组织因党内权斗问题派系林立,而共产党则以共青团为纽带开启了新的青年组织发展之路。到抗日战争时期,开始进入以两大政党为指导,以战时工作与服务为主要任务的革命时代,直至抗战结束。至此,我国的青年组织也经历了由无组织、无领导到有组织、有宗旨的被领导阶段。这期间,青年组织内部虽出现了各种问题,但在自我调整下,相关问题都逐步得到了妥善解决。这足以说明,中国的青年群体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其巨大的能量和创造性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 [1] 卢茨. 中国教会大学史[M]. 曾钜生,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7-8.
- [2] 费正清. 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161-165.
- [3] 赵晓阳. 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本土和现代的探索[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3-18.
- [4] 望瀛,古任. 世界基督教学生团事业之勃兴、论中国学生今日所负之责任[J]. 青年,1909(7):193-198.
- [5]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第七次大会组合之报告[J]. 青年(上海),1916(1):7-16.

- [6] 桑兵. 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5: 145-146.
- [7]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 中国青年运动史[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4.
- [8] 大连中华青年会四周年之回顾(附图表)[J]. 青年翼, 1924(6): 4-12.
- [9] 李焕文. 中国青年运动的新阶段[J]. 国立中正大学学生, 1941(1): 8-24.
- [10] 余家菊. 教会教育问题[J]. 少年中国, 1923(7): 1-19.
- [11] 刘剑. 北京青年组织志文稿[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7: 147.
- [12] 任夫. 十年来吾国青年会之重要变化[J]. 青年进步, 1927(100): 236-243.
- [13] 郎醒石. 中国革命与中国青年[J]. 中国青年(重庆), 1940(1): 23-25.
- [14] 实庵. 青年们应该怎样做! [J]. 中国青年(上海 1923), 1923(1): 2-4.
- [15] 昌群. 五卅后两年来的青年运动[J]. 中国青年(上海 1923), 1927(11): 261-278.
- [16] 辟世.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过去的一年[J]. 中国青年(上海 1923), 1926(121): 590-595.
- [17] 李友樵. 蒙童团部: 蒙童团之进行与服务[J]. 华东青年团教育部月刊, 1921(2): 6-10.
- [18]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 中国青年运动史[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4.
- [19]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 第 11 册[M]. 北京: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8: 3.
- [20] 贺海轮. 延安时期青年运动史[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5.
- [21] 徐波. 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的青年救国会[J]. 青运史研究, 1981(8): 23-28.
- [22]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陈云文选(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179.
- [23] 蒋委员长告全国青年书(专载)[J]. 政论(汉口), 1938(15): 13-16.
- [24] 三民主义青年团团章[J]. 中央周刊, 1938(4): 24-25.
- [25] 何应钦. 青年训练与青年教育[J]. 中国青年(重庆), 1941(1): 17-19.
- [26] 胡铸坊. 谈新青年运动[J]. 青年月刊(南京), 1935(1): 28-33.
- [27] 小青. 浙江青年的救亡运动[J]. 青年团结, 1938(3): 17-19.

(责任编辑: 王新云)